

民族自觉的文学塑形与异化镜像

——论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

罗杰^{1,2}

(1. 文山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 云南 文山 663000; 2. 云南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从异质文化间文学镜像角度来思考竹枝词的近代转型, 就会发现清末民初竹枝词中出现了“假洋鬼子”。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西俗东移和西学东渐的产物, 集中地反映了现代民族意识觉醒中社会群体认同的主体性。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主要包括有“冶游弟子”“留学生”“洋奴”“西崽”等四种类型, 在竹枝词中经由书写者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审美认同等多重视角中建构出文学文本意义上的异化镜像, 此类形象为知识阶层对文化危机、文化自觉、文化选择等社会转型心理诉求提供了路径。在维新变革的社会思潮中, 可窥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民族自觉的细微变化, 同时也是中国“他者化”的文化隐喻, 具有特殊的文学审美价值。

〔关键词〕“假洋鬼子”; 文化记忆; 民族自觉; 异化镜像; 审美意识

〔中图分类号〕I 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 (2021) 01-0076-11

晚清到民初, 特别是国门洞开后的北京、开埠及《申报》创刊(1872)前后的上海, 竹枝词作为承载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及“西学东渐”思潮的文学载体, 出现了书写“假洋鬼子”的现象。顾炳权所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历代竹枝词》, 多是上海开埠后国人对待西方文明时民族心理的真实反映。王利器等所编《历代竹枝词》与丘良任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较完整地呈现了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冲突过程中, 帝都北京和魔都上海等地区的“假洋鬼子”。因北京和上海地区竹枝词较集中地反映了知识阶层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心态的微妙变化, 以此来窥探书写者民族自觉的文学塑形和异化镜像。此间, 处于时局动荡中的有识之士, 如兰陵忧患生、李伯元、富察敦崇、袁祖志、余愧青等, 身份多为旧式官僚、底层文人、报界文人、教师、知识青年等, 他们借由竹枝词书写或反思中国的现代性, 或对半殖民化社会现象反思后书写了“假洋鬼子”, 是文学文本中中国“他者化”的一个新视域。

这种文学现象需要挖掘书写者的主体性以充

实此类文学形象的审美内涵, 笔者更倾向从书写者的民族自觉和审美意识嬗变角度来考察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 即其呈现了中国人半殖民化心理从异化到找回主体性的文学镜像。“假洋鬼子”是书写者对当时部分国人盲从“西洋”的群体认同之文学塑形, 此类形象多因文化价值观念受到西洋文化冲击, 在竹枝词中被书写为“鱼龙混杂”“不土不洋”“不中不西”等价值错位的文学形象。从词义上来看, “假洋鬼子”在半殖民文化语境中渗透了书写者对涉“外”人员的戏谑、憎恨、疑惑、揶揄等复杂矛盾心态, 而表述“西洋”时则带有明确的审美价值指向性, “‘洋’字带有一种崇敬之情, ‘洋’字也逐渐获得了‘进步’和‘现代’内涵, 新的想象和观念附入了‘洋’字”。^[1]因此“‘假洋鬼子’既是半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产物之一, 又是透视殖民地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意愿分歧与西化病症的一面镜子”。^[2]由此, 在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是一类被文人书写进竹枝词中身份混杂、民族意识淡泊、身份认同暧昧、时新观念错位的文学形象, 他们在自我认知上存在病态人

格，这类形象在竹枝词中多被嘲笑、揶揄，且不被群体认同的异类。书写者通过“假洋鬼子”镜像般自我书写，体现出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与“西学东渐”思潮中的民族自觉，揭示了书写者对自我民族文化根性的总体想象和表述策略，其蕴含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值得深入考究。

一、竹枝词中“假洋鬼子”文学形象类型

“假洋鬼子”是在中国半殖民地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生发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生成的一类文学形象，不仅出现在清末到“五四时期”的小说中，也出现在广纪见闻的都市洋场竹枝词中。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本质特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根性为中国”且“人格异化者”，因经受西洋文化、殖民文化影响，转而在心理上接受西洋文明，在文化观念上崇尚西洋文化，在穿着上表现出以仿效西式装束为荣，在行为举止上媚洋弃中，在语言上中英夹杂，这就是他们突出的文化身份特征。从回归文学本位出发，考察竹枝词中“假洋鬼子”文学审美价值及社会文化形态建构为殖民化色彩的文学镜像。试将“假洋鬼子”形象归纳为四种类型，大致上反映出书写者对待中国“他者化”的四种情感倾向。

（一）土洋混杂的冶游子弟

这是在清末竹枝词中较早出现的“假洋鬼子”形象，伴随东西文化合流时期在文人笔下反复出现，他们因人格错位时常在行为上表现出异于同类的行为，主体性缺失，表现为：

1. 在衣着上刻意效仿西洋的冶游子弟。冶游子弟表面上是效仿西洋后追寻时新生活，骨子里依旧恶习不断，旧有的丑陋习俗仍是其人性根底。如：“冶游子弟尽时装，脚踏车飞马路旁。草帽带头烟咬口。挥金如土冶游郎，声色欢娱醉画堂。引得倌人多浪费，旗装卸去换洋装。”^{[3]269}

2. 怪腔怪调的纨绔子弟。在书写者看来，他们身为中国人，说话却不时夹杂着“洋话”，作为母语的汉语在殖民化英语面前成为不自信的心理表现。在书写者眼中他们是：“世界人豪剧可悲，学来满口怪名词。”^{[4]319}“偶将音语学西

洋，不识一丁装体面。”^{[5]172}

3. 余习未改的三尺长豚尾。书写者眼中“辫子”与西洋文化是不能同时混杂为一体的，否则就是头顶辫子身着西装的“怪”人。如这首刊于1916年《爱国白话报》上的《都门竹枝词》：“短衣盘辫太难堪”“谁知也戴新皮帽，豚尾尤存三尺长。”在身为满人的富察敦崇眼中这些纨绔子弟成为笑谈，揭示了西洋文化影响下国人为了赶时髦竞相模仿的盲从行为。如《京都新竹枝词》：“松松发辫都拖背，爱好还梳革命头。飞篷新髻号东洋，双镜金丝半面妆。”“既学欧西要学会，如何细滚黑镶边。当年纨绔留余习，程度教人亦恍然。”^{[3]172}

这些因时局动荡却能马上从封建转向西化，不中不西的着装，不伦不类的谈吐，或拖着三尺长的辫子到处显摆。以当时知识阶层认可的“西学中源”的观念来看，此类形象的精神层面是旧习遗留的机会主义投机者及“忘本”异化行为，对此书写者以“多如狗”来表述他们，以犬类来描述他们，隐约以憎恶的态度来审视他们的行为。

（二）改装治束的留学生

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还呈现了“时代性”和“异质性”，这体现在对留学生的文学塑形上，在竹枝词中有对留学生的多重建构，其中只有对改装治束的留学生持“假洋鬼子”嘲讽态度，对此类“假洋鬼子”的书写，多从改洋装、学欧风、剪辫子、戴眼镜等角度进行观察。如《留学生改装归来》：“出洋子弟改洋装，辫发无存祖制忘。航海归来人不识，惊传某里到西商。”^{[5]269}“奇装异服仿西欧”“志士而今喜改装，托言留学到东洋。”^{[5]18}以及“昨喜有朋归海外，今朝得意服西装。”^{[3]320}随着介绍西洋书籍的出现，报刊、电器、服装等西风渐盛，中国本土文化的弱势、落后加剧了各阶层新旧知识观念的混乱，导致对留学生的态度也呈现出异质性、时代性、复杂性，书写者以是否“改装治束”来审视，他们关注留学生中过于西化改装、生活方式、举止行为形成反差者，将之表述为“假洋鬼子”，书写者对此类形象的情感倾向，彰显为“留洋”与“国耻”之间游离的矛盾态度。

(三) 甘受洋人指使的洋奴

半殖民地社会中的病态人格在此类形象上集中呈现,多指在租界工作的巡捕、地保、通事(中外贸易间的翻译),依仗洋人的权势,他们虽处在洋奴中的最底层,身份地位不及印度籍洋仆,却在国人面前趾高气扬,行为上是狗仗人势的“假洋鬼子”。如:“还多华捕欺同类,全仗洋人听指挥。”“甘做洋奴供指使”,^{[5]12}“华人根性甘奴隶”“洋泾浜话略能知,最好西人购物时。”“短衫窄裤换西装,充捕居然意气昂。”^{[5]186}而竹枝词中有一首最能体现书写者对此形象的揶揄态度,如:“寻常顾客休相扰,此处欢迎外国人。”^{[5]407}

只为外国人服务,国人却被拒,依此洋奴的媚态奴性行为可见一斑。对此,在民国教师余槐青眼中,巡捕等在租界为洋人服务者多是洋奴,也是亡国奴。清末民初文人柴萼在《竹枝词》中书写道:“一夜秋风撼北都,亲王贝子别妻孥。车马驰向交民巷,争乞西人作护符。”民国时期新知识阶层于方舟一针见血指出洋奴的媚洋嘴脸:“见了西人便鞠躬”“为谋衣食利争趋,愿作西人养马夫。”^{[5]302}还有帮洋人养狗的狗夫,这些甘为洋人使唤、甘当洋人工具的中国人,都因为从事职业低下又因不中不西的谈吐,也被视为“假洋鬼子”。书写者对此类涉“外”形象持“鄙视”态度,在传统观念的认知中他们没有骨气,只因沾上些西洋气息就不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故书写者多嘲讽他们为民族败类。

(四) 文化合污的“西崽”

“西崽”又作细崽、崽子,词有贬意。即清末民初,西方殖民文化中的一部分内容,是指洋人在中国大城市开办的洋行、西式餐馆、旅店等雇佣的中国男性,多为年轻男子,衣着西式化,受洋人文化熏染,用西方礼仪待人接物,因与同时期中国传统行业从业者形成鲜明对比,故在竹枝词中成为西洋礼仪与身份差异的形象。清人汪述祖《竹枝词》“东安市场行”:“不供匕箸用刀叉,世界维新到酒家。短窄衣衫叫细崽,咖啡一盏进新茶。”^{[5]220}北京东安饭店为西式酒楼,穿着洋化的侍者叫“西崽”,如:“惹得西商西崽呼,窄袖短衣多洁白。”“烹茶煮酒列与台,月令洋蛱仅几枚。别有深情年少子,存心岂为这般

来。”^{[5]186}晚清文人袁翔甫则认为他们的职业是下贱的:“群将细崽唤洋奴,信是人间贱丈夫。”^{[5]252}

西崽与洋奴有一定的区别,这需要从清末到民初的半殖民社会文化语境来认知。洋奴形象是因他们在人格上失去民族尊严,在行为上表现出媚洋的奴性,骨子里已经从属洋人主子的文化,他们是殖民文化的产物。而西崽则有特殊文化人格,他们因从事的职业服务的多是洋人,穿着上是西洋化,持西方礼俗,洋奴人格上的媚态并不明显,整体上呈现出来的是他们对国人与洋人的不同态度上。书写者的情感态度更倾向于“怜悯”“揶揄”来表述其处境。外因虽是此类形象身为男儿志向却是为洋人服务,根本原因是书写者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萌生了民族自觉,为此晚清文人詹鸿章曾感叹“西崽几辈持青春”。

从以上论述可知,竹枝词中关于“假洋鬼子”的书写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的都市竹枝词中,从他们对待西洋器物的态度到接受西洋文化心理层面的扭曲都加以审视,对其穿着打扮、行为举止、价值观念、职业身份、文化人格等层面视觉表述。又因帝都北京、魔都上海各自的都市文化空间与精神文化气质决定了“假洋鬼子”书写略有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关于“假洋鬼子”行为举止的视觉表述。在上海竹枝词中,书写者从国民崇洋习气来书写,如着重对“英语”“燕尾服”等语言、穿着、做派欧化的视觉表述,生动形象地建构出表象上一派洋气,其根底下土洋混杂的畸形国人,呈现为一幅幅嘲讽图像;而北京竹枝词中则对身着洋服却留盘“辫子”的身份错位心态层面来书写“假洋鬼子”,倾向于从是否摒弃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来审视“假洋鬼子”,更强调嘲讽意味。(2)对新知识新观念的彷徨。上海竹枝词中的留学生是通过改装束后的留洋镀金,特别着重书写留学生戴眼镜、操英语、着西装,更突显出上海因地缘关系造成对留学生改装与学识的误解;而北京竹枝词中的留学生虽然留美归国西装在身,面对考试定时却惶恐,可见其在国人面前仅是披着“洋皮”的中国人。在精神气质上,对这类“假洋鬼子”书写者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是披西洋皮的中国郎,是在病态的社会环境中滋生出

来的畸形儿，指出“假洋鬼子”因文化认同造成身份错位。(3)揭露国人的奴性丑态。上海因开埠后城市文化兴起，因此多书写在租界工作的巡捕、地保、通事（翻译），这些洋奴在特殊的地缘环境中构成了上海城市形象的一部分；而北京竹枝词中则指向旧式官僚换了洋装后为外国人做事的人。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洋奴多为有一定身份地位的旧式官僚或子弟，社会身份地位明显与上海竹枝词中的洋奴不同。洋奴是从骨子里到外在都一副媚洋态，这是他们在末日来临前生存的一种投机取巧手段。(4)从男性新职业来定性“假洋鬼子”。上海竹枝词中较客观地书写了洋场中的“西崽”，从着装到服务态度都受到西洋文化的熏染，仍有揶揄意味；而在北京竹枝词中“西崽”则表现出是在西洋文化强势影响下产生的，从事此类职业的男性青年不被认同，这是因“帝都”与“魔都”文化差异性造成的。

通过对竹枝词中“假洋鬼子”的类型归纳，大致勾勒出知识阶层在异质文化间冲突过程中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分裂，以及在文学文本中书写了半殖民“中国形象”的异化形态。可见，书写者处在自我与他者文化比照的困惑中，文化转型体现为从直观的欧化装束到理性的科学文化，呈现出思维方式上的转变，表征着在不确定的社会秩序中显露出对本土文化生存空间的焦虑。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竹枝词中“假洋鬼子”承载着书写者文化身份的两难处境，因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语境中生成，他们如同一面西洋镜，在折射出知识阶层眼中的“中华文明的贫与弱”，同时固有的“中国形象”在西洋镜的照射下开始呈现出异化镜像，在文学文本中生成了中西文化间交流后的异化形象。

二、“假洋鬼子”的生成与建构

为何书写者将视角聚焦在涉“外”的此类人员上，其背后隐藏的是何种诉求？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是国人现代化思辨的异化镜像，是书写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对国人人格异化者的文学塑形，是书写者在异质文化间的焦虑、无助的精神体验与文学想象共同影响下激发了民族自觉，在文学文本中建构出多元

异化的文学形象。作为文学镜像意义上的“假洋鬼子”，书写者借由知识阶层构成类型复杂“内部他者”的审美视野、异质文化间交流和多重身份的深度书写，在竹枝词中生成与建构出具有文化间性审美内涵的“假洋鬼子”形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竹枝词书写者类型

近代中国知识界开始转型是以19世纪中期为标志，又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开启新知识的窗口，这预示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与知识构成发生了转换，“有识之士从虚骄蒙昧中走出，睁眼看世界，提倡实学，接触西学，在知识结构与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具有现代气息的变化，开始向新式知识分子转换。在近代早期，西方现代知识在华传播的渠道已经打通，从事现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平台开始搭建，接触了现代知识并以着手运用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雏形开始显露。”^[6]国门洞开以后，身处北京、上海的知识分子成为应对纷繁时局和社会时新的首当其冲者，从近代竹枝词书写者的身份来看，主要有以富察敦崇为代表的旧式官僚、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界文人、以兰陵忧患生为代表的底层文人、以叶仲钧为代表的教师、以余槐青为代表的新知识青年等，他们大多从旧式文人转型而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身份地位相对不高，或是旅居大城市的文人雅客，或是以教书为生的教师，或是由旧式文人转型的报界文人，或是接受新思想的青年，却都身处殖民文化日益浓厚的城市，较早认知西洋文化浸染国人，欲借助西洋镜像来反思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

竹枝词书写者类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报界文人，报界文人多从旧式文人转型而来，此类文人更具从传统知识分子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的典型特征，且与传统文化有深厚渊源，是对西学有一定认识的文化人。(1)他们处于文化选择两难境地，面临传统与时新的文化双重选择，面对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出现文化信仰危机，陷入“文化之根”与“民族之魂”的困顿中。(2)在生存境遇方面：在仕途失意时做出了新职业抉择，他们从“举业”转向报业，在关注西方文化时表现出对自我文化的审视，基本上保留了底层文人的书写视角，关注普罗大众在文化转型时

期的心理状态,为他们书写“假洋鬼子”提供了文化空间。这类文人以李伯元、袁祖志为代表。如报人李伯元,江苏武进人,多次有入官机会,但他执意不入仕途,后至上海,独辟蹊径先后创办《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等小报,多发晚清丑态、社会奇闻内容,特设《繁华报》为《官场现形记》说部,连载小说。而为学界熟之的是其在小说《文明小史》中书写的“假洋鬼子”,塑造了在留学狂潮兴起之时,生硬地照搬西方文明的国民丑态。李伯元曾作竹枝词体《捐班杂咏》,认为:“足当《官场现形记》题辞读也。”^{[3]221}为了表达对病态的晚清社会空间中国国民丑态的痛恨,他建构了“假洋鬼子”,秉持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通过文学书写以求“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7]61}另有民族自觉人士袁祖志,又称袁翔甫,咸丰时官同知,为清著名诗人袁枚之孙,别号“海上逐臭夫”“忏情生”。清末时旅居上海,曾随晚清官员到欧洲考察,为《申报》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担任《新闻报》主笔。在《申报》上刊发了题名为《海上竹枝词》《沪北竹枝词》(1876年)的近百首关于上海洋场竹枝词,其撰写的稿子多关注政治时局,中日甲午战争初始,他发文力主抗日,力图维新。袁祖志在上海从事的报业文人职业和社会生活圈子,加之家庭背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原因的影响,使其在从传统士人向新型文人转换过程中出现了生存焦虑,同时也决定了其对上海城市空间中的异文化持“文人论政”的视野。因此,其笔下的“假洋鬼子”成为知识阶层找回主体性的一面镜像,折射出报界文人的爱国意识与民族情感。此类书写者在面对中西文化混战时,文化身份、民族国家等突显出他们的民族自觉,自觉地关注视角与书写行为是此类知识阶层主体性的显现。

此外,还有教师、新青年等身份的书写者。与旧式官僚文人相比,他们的社会阶层决定了他们的关注视角。此类知识分子更关注国民的生存问题,忧虑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命运,同时对当时社会乱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反思知识阶层的社会责任,借助“西风”反思本民族文化。虽对西方文化有一定偏见却看到国民失去主体性的媚洋丑态,激发出复杂的民族情感,这为中国知

识分子的民族自觉提供了更多维的思想空间。多数竹枝词书写者都有在中西文化交融前沿城市的寓居体验,身处在半殖民地社会文化色彩浓重的地区,深知中国各阶层处在此间的社会文化心态。例如,民国初国学教授叶仲钧在《上海鳞爪竹枝词》中分类题书写:“欧化:一自中华海禁开,欧风美雨逼人来。少年喜学邯郸步,竟致狂澜莫挽回。”“基督教:欧美骛势渐东,全凭基督作先锋。直将文化来侵略,争奈吾人好盲从。”^{[5]137}可见当时已有知识分子觉察西洋文化入侵,开始审视国人盲目追求西洋文化的社会心理症结,借由竹枝词的现代转型来文学塑形“假洋鬼子”。竹枝词书写者这种“以文论闻”的表述方式,实则是“当表述被书写而不再是语音时,那么表述自身怎么样呢?往往是文化记忆中最鲜明的话语要被突显:书写保存了话语,使话语成为个人与集体记忆的一种有效档案。”^{[8]107}从书写者类型的身份构成以及他们的审美视野来看,他们在竹枝词中建构“假洋鬼子”,不只是中国“他者化”论争心态的形象化,还有效地将知识阶层对待西洋文化的话语细微书写为集体记忆。只有当知识阶层将对待他者文化的情感倾向投注在“假洋鬼子”上,彼此之间才能在西洋文化的态度上形成对话,这也是竹枝词中“假洋鬼子”生成的缘由,并间接地呈现出他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记忆、表述话语和书写心态,将国家民族情感与文学塑形交织为一体。

(二) 书写者对“内部他者”的审美感知

在书写者眼中,“假洋鬼子”作为文化内部的他者,既对他们具有“非我”的文化身份存疑,同时又将其视为“根性为中国人”视域下的“自我”异化,实则是形成了“我们真”与“他们假”两类族群对立的表现。在战争频繁、殖民入侵、社会动乱、生存焦虑、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假洋鬼子”具有了异质文化交融中他者形象特征,这源于“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亲眼见识西洋文化的人和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世界变化的人,开始对中西文明从体到用进行了严肃的比较……所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不免对于中西差异处处留心。”^{[9]405}正是这种对内部文化他者的小心审视,形成了通过文学书写来渲泄愤懑。如清

末兰陵忧患生在《京华百二竹枝词》中视觉表述了其微观视角中社会风气的变化：“大清宣统建元年，事事维新在眼前。闲写竹枝词百二，可能当作采风篇。”其中有了其对新事物的看法：“小帽新兴六褶拈，瓜棱式样美观瞻。料应时尚钻营计，第一头颅总要尖。新式衣裳夸有根，极长极短总难论，洋人著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3]89}从中可知，当时文人面对时下国人追求时尚学西风时矛盾心态，面对同属“中国人根性”的内部文化“他者”，书写者是将其视为异文化来关注。书写者的情感倾向既有对“留学”功用的憧憬又有对自我文化的不自信，其社会根源还因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已无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提供给社会民众精神上的审美需求。这一时期民众普遍处于中西文化混战后的精神荒芜中，“假洋鬼子”的出现是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直接产物，也是书写者集体无意识中的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底气不足又抑或是对“崇洋”的本能恐惧，自觉地将“假洋鬼子”塑形为自我形象的异化。书写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关注“内部的他者”，往往受原生文化既有观念的影响，社会群体的认同是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在于族群互动中人们能够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同的成员资格，而维持族群边界，不断地表述和验证十分重要。”^{[10]6-7}在书写者的话语中，“假洋鬼子”是被辨识为异化的他者，对“假洋鬼子”的服饰、发型、言行、生计、形貌等与身体延伸相关的视觉表述中，建构出“假洋鬼子”作为“内部他者”的群体，此群体暂时转移了知识阶层的文化焦虑，群体间认同的主体性思考让其成为“替罪羊”。

西洋文化的强势进入打破了旧有的知识结构，以及传统知识体系之外的他者世界及他者文化价值观念。中国知识分子原有的知识体系并未马上根除，新的知识体系也未建立，在“中”“西”知识体系混乱中，“假洋鬼子”也就是在这时，集中体现了国人仅停留在表层模仿上，是缺少基于本土文化创新的表征。北京、上海两地知识分子对“假洋鬼子”书写集中表征了“中国形象”异化的审美感知，也是知识分子借由书写行为在文学文本中达成共识，实现对殖民文化问题的交流。“假洋鬼子”并非只是“社会集

体想象物”，是异质文化间“混合物”，反映了面对“欧化”“西风”影响下的社会群体心理。同时隐含着书写者的语气、表述、态度、关注等主体性因素交织而成的自我形象，在如何面对文化危机前，主体性的现代转型与社会知识更新未能契合时，“假洋鬼子”寄寓着现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尴尬处境，在表述的书写策略下隐蔽着国人异化了的半殖民化心理，也反映了社会群体对此类涉“外”人员的集体阐释。

（三）异质间文化交流与文化视野的拓展

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主要出现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竹枝词中，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北京是东方帝都、上海是东方魔都，彰显出在半殖民语境中的精神气质。这两座城市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很好地承接了西洋知识和欧化现象在中国的演化，意味着“假洋鬼子”的主体间性和异文化特性。在此间生活的知识分子较早地感知到异质文化“跨界”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对“西”“洋”的语义使用上。在单独使用时，这两词基本上是中性色彩的，然而，在文学文本中这两个词与其他词组合后就明显带有一定的情感倾向，“西崽”“洋奴”就已经被书写者赋予了形象生动性、文化象征性以及一定的审美内涵。其次是在跨越了空间边界的“假洋鬼子”，是伴随着东西方异质文化交流的生发而生成的。他们在中西文化对抗的缝隙间寻找生存之道，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等城市竹枝词中均有细微视角提供参照，特别是伴随着租界这一生活空间的出现，以上海为首的具有殖民色彩的城市出现了学欧风的社会现象。由于欧化现象日盛，“西洋”自然成为“新潮”“时尚”的代名词，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暗流不谋而合。再次是知识观念的跨界，如换个角度来思考，“而‘人’或‘人生’之究竟，基本上是以西洋作为模范的”^{[11]61}，“假洋鬼子”却也是较早感知到西洋文化后迅速转化身份的，只不过，他们这种脱离了中国根基的“崇洋”身份转化不被社会群体认同。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是多元文化交融下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总体形象，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激发民族自觉后，渴求能够对话又惶恐的现实境遇与思想困局，他们苦于无法言说的内心焦虑与急促求知，这种渴

求交流的文化视野隐喻在“假洋鬼子”的文学塑形中。书写者觉察到中国“他者化”或“西化精英”出现后心态开始失衡,借由竹枝词书写来传达能否“跨界”文化对话的心理诉求,即通过书写“假洋鬼子”,表达了他们对异质文化间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异化现象的认知,同时反思了中国文化落后的根源。“假洋鬼子”身上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待西洋的社会心理,即国人崇尚西方事物往往是实用主义盛行的表现,“假洋鬼子”是这一始作俑者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从另一角度也折射出书写者追求能够展现中国形象的文化视野,具体表现为借助竹枝词书写“假洋鬼子”来争取话语权,必须接受西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的事实。书写者敏锐地觉察了中国“他者化”,在此过程中文化视野也得到了拓展。在话语上对他者文化态度的变化,彰显了在西洋文化强势入侵下,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知识阶层虽有彷徨,至少“假洋鬼子”拓展了他们的文化视野和知识边界,也辨别了“他者化”的中国人。

从竹枝词中对半殖民地文化全知视角的关注来看,在半殖民语境下,知识阶层在中西文化多次纠缠不清的论战中国际视野浮现,并逐渐生成异化镜像“假洋鬼子”。正因为是在中西文化跨界间隔中生发出来的文学形象,间接地说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必然。从竹枝词书写者群体、书写者的审美感知、书写者的异国想象来看,竹枝词中“假洋鬼子”的话语表述符合“社会认同过程研究中的事实,即将贬义刻板印象赋予外群”,^{[12][81]}特定的社会属性、文化身份与心理诉求的整合下,竹枝词中“假洋鬼子”可视为一面透视半殖民“中国形象”的文学镜像。

三、“假洋鬼子”的文学审美价值

从跨文化视域中文学形象的嬗变来看,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书写秉持讽喻文体功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者文化接受上的矛盾心态。面对强势的西洋文化,知识分子以文学书写来自省、改良、图治、求变的心理诉求,反映了中国知识阶层在“西学东来”思潮中交织着诸多对中国“他者化”的思考,具有一定的认同

功能。竹枝词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质疑西洋文明的激烈冲撞时,将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融汇。因此,当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喻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出现困境时,一个异化了的“中国形象”在文学文本中呈现,源于“假洋鬼子”这面真实存在的镜子。当书写者赖以生存的本土文化无法满足一个民族对自我认同心理诉求时,书写者在半殖民地社会转型期间长期累积的民族自觉意识,转向在文学文本中极力向世人书写本民族的自我形象,以激活潜藏在对“西方”爱恨交加矛盾心态背后的民族主义。故力图摆脱传统认知中的“假洋鬼子”,应当科学客观地反思其审美价值。

(一)“西洋”镜像与开启民智

“假洋鬼子”模仿“西洋”实则是中国的“欧化”“西学”“西风”,在竹枝词中与之对应的是“效颦”“洋化”“时尚”,这实际上是书写者对殖民化后如何“开启民智”的审美感知。表现在城市空间与文学空间的交叉重叠上,首先是城市空间的双重性,书写者的全知视角集中体现在对涉外的通商口岸、租界、租地等城市空间上,原属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空间,被外来力量强迫切割为西化风格的地界,在同一天空下区隔为两种文化特质的跨界空间,形成了先进、卫生、有序、明亮、时尚的西洋文化空间,与落后、脏差、混乱、无知的传统文化空间的比照;其次是在书写者的微观视角下,客观呈现了国人对西洋文化的趋之若鹜甚至是盲从心理的表述,外在空间的变化业已从内在的心理空间里趋向西洋文化。凡涉及“西洋”二字的,在书写者眼中同时存在着双重的文化选择心态,一方面是追趋逐者“西洋”已经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明显的比照。1860年后,在多次交战后,半殖民地社会现实让国人持中华帝国至上的勇气都已荡然无存。民国文人徐朗轩在《续羊城竹枝词》中发声:“吸德文明风气早,自由花种自由开。此花不是寻常种,料自泰西异国来。”^{[13]377}故当“西洋”作为一种被近距离接触的文化现实时,其代表了一种优于本土文化的价值判断,书写者在做出这种判断的当下,是以中国的殖民色彩社会现实作为参照的,正是在两者的比对中发现了自身的落后与无奈,不得不模仿

“西洋”，只是如何模仿成为一种撕裂“内部”的症结所在。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总是以文化使者的身份来透视民众对待“西洋”的心理。模仿“西洋”客观上来说也是开启民智的一种途径。起初“假洋鬼子”多少是有开风气之先的功用，其后，明眼之人开始质疑一味“西化”。因为书写者反思青楼女子也“善操英语媚洋人”，如此这般，“西化”之路何在，且国家民族命运“西化”将如何？正如民国时期笔名为“心真”的书写者在《洋泾浜新竹枝词》中表述其见解：“文化：建设先从文化起，我人本位自中华。民族奋兴由此路，光明灿烂望非奢。”^{[5]500}从这一角度来看“假洋鬼子”形象与开启民智之路相伴而生，在清末到民初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是中国形象的多棱镜，面对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抗，书写者始终视之为“内部他者”，也就导致书写者在处理“假洋鬼子”的书写策略上，往往杂合着迁怒心态来表述。“假洋鬼子”是书写者对他者文化中有关中国形象的总体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自觉在文化对抗上的调适和文学书写上主体性的显现。

故我们必须注意当表述“假洋鬼子”时，在半殖民语境中“西化”与“本土化”的内部冲突及其文学审美上的意义，讨论“西化”就是讨论“本土化”与“民族化”，这类讨论无可避免地将问题引向中国的“他者化”和非西方的“异己化”。

（二）辫子隐喻与留学之思辨

辫子是主体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隐喻，是旧有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陋习，也是他者眼中东亚病夫的耻辱。在此，由辫子关联的是中国文化弱势和固守的华夷文化观念，“假洋鬼子”的身体感官成为中西文化对抗中一种不可言说的隐讳。在书写者眼中，服饰、发式、语言、饮食等是与身体相关的延伸，一种社会文明隐喻，对西洋的认同与对自我身份的排斥。新旧文化传统的认同问题、中西文化贬抑冲突，其实质不能脱离作为文化主体的书写者其自身主体性的认知。一方面书写者是从官方自救的行为中看到留学的本质，终归只是统治者的苟延残喘的手段，发生了从贬

洋到媚洋的态度转变；另一方面是对权威崇拜的否定批判。书写者看到半殖民地社会中民众一知半解的认知能力，赴欧美日留学的目的是什么？在书写者眼中留学生自身并没有完成现代化，他们只是反对专制向往自由，却依然崇拜权威，对能否治疗“中华民族的病”存疑。辫子下着洋装的行为，正是中西文化较量过程中主体意识错乱的表征，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因此，没有了“中国人的根性”何以立足？西洋的固然好，只是“世道年来变得多，男精女怪似妖魔。平头剪发趋西式，学得皮毛究若何？”^{[13]637}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明显地体现了书写者在否定了“他者化”的同时尚未找到值得肯定的，这归结于当时中国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并未建立起可对话的可能。书写者借由竹枝词书写与建构“假洋鬼子”，是对自我的发问，也是对社会的发难。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在总体上具象化民族自觉的主体性，启蒙是“中体西用”还是“西学东渐”？所以在“假洋鬼子”身上的辫子是一种文化隐喻，或者说“假洋鬼子”的豚尾在书写者眼中是文化耻辱的象征，“假洋鬼子”辫子留与否及改装与否，隐喻了书写者寻求精神出路时的屈辱。“假洋鬼子”辫子隐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旧习，这与留学生求学形成了悖论，西学中用的目的是否失去主体性？由此而论，书写者并未真正理解中国落后根源何在，即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觉在现实生活并未有与之相对应的生存空间，而“假洋鬼子”的病态人格又是书写者不认同的民族身份，这正是近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症结，即极力在文学文本中对自我形象书写，又摆脱不了半殖民社会文化空间的约束，找不到可以治疗病态国人的良方。书写者对“假洋鬼子”的书写其本质上是对异质文化间交融后的人格异化现象的审美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不舍，对西洋文化的观望，此间面对涉“外”人员“趟水”西洋文化资源，多少导致了部分知识阶层人士的心理失衡，“假洋鬼子”是书写者对半殖民“中国形象”异化形态的自我想象。

“假洋鬼子”的文学审美价值在于其特有的半殖民地色彩和异化镜像，从回归文学本位的角度来看，它的生成与建构能够帮助我们体验知识

阶层的精神痛苦、多重身份的纠缠不清及对殖民文化态度的反思。“假洋鬼子”提供了一种文学镜像,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他者化”的深层思考,让我们审视中国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西洋”是否无限好?

四、民族自觉何以可能?

不可否认,思想需要落实到现实中才会影响生活,书写者的民族自觉需借由文学塑形才能具体化,竹枝词中关于“假洋鬼子”的建构适应了复杂的半殖民文化语境。在一段时期内,“假洋鬼子”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一阶段“中国形象”的异化镜像,同时是在比照西洋强势文化的视野下被建构的。“假洋鬼子”生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主要表现为:(1)民族自觉与西洋文化资源的竞争关系推动了以竹枝词为表述“西化”现象的媒介形式。因中西文化冲突产生了剧烈的思想分歧,统治阶层、精英、底层都卷入这场风暴中,都暂未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找到历史定位,其本质是与“假洋鬼子”之间存在着西洋文化资源的竞争关系,以致心理失衡后的忧愤。(2)主体的现代性思考。底层民众缺乏对殖民文化的判断能力,面临文化选择时的民族意识不明确。这两种情况造成了“假洋鬼子”在中国存在,并为“民族自觉”的可能性提供了“底层视角”,在竹枝词中形成“在场的他者”的异化镜像。书写者的现代化认知中同样涉“外”,为何对“假洋鬼子”持不认同态度,书写者的认知中是病态的旧有社会滋生了涉“外”的“假洋鬼子”,其已丧失“主体性”。在对“假洋鬼子”的阐释中,应回归文学本位,理解底层文人借由竹枝词书写“假洋鬼子”,来折射出半殖民文化色彩,且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及文化自信细微变化等复杂社会心态交织在一起。在此交织过程中,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与其他文学类型中的“假洋鬼子”共同建构了半殖民“中国形象”的异化形态。

依此,在竹枝词适应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拓展出新的文体功能和题材主题,故我们可从社会文化大众消费角度来思考,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书写给谁看的问题。《申报》刊载大量竹枝

词的事实验证了竹枝词的底层书写和近代转型更关注时新类和陌生化主题,适合了大众的消费需求,满足了普通大众猎奇的阅读习惯。与小说中塑造的“假洋鬼子”相比,竹枝词更直接地向底层化和通俗化转型,更契合报刊媒介的消费特点。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书写者为此做出了审美话语的双向选择,一方面他们立足于中华民族命运前途的忧患意识,以讽喻手法批判“假洋鬼子”的“非我”话语,书写其荒诞性,彰显来自民间的狂欢色彩;另一方面,书写者通过比照他族,在西化、西学东渐思潮下在竹枝词中对“假洋鬼子”形象的文学塑形,并在审美意识上与之决裂,体现为转向本土文化回归的民族自觉意识。“近代中国的自我认识史,实际上与关于‘世界’和‘亚洲’的观念变迁是一体的,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缺乏一个作为对等的‘他者’,仿佛缺少一面镜子,无法真正认清自身”,^{[9]458}可以说,近代竹枝词中“假洋鬼子”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知识阶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与“西方智慧知识”的自我镜像。在近代社会,知识、文化转型过程中,书写者找到了一个与他者、自我相异的“内部他者”作为一面镜子,开始探寻如何认清自我和书写自我形象,在竹枝词中书写者的“假洋鬼子”文学塑形,认清了“自我”形象。“人始终是在追寻某种形状某个形象而将它们视为是自己的自我。而这一切得以产生全由认同的机制。人是通过认同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的功能。”^{[14]7}竹枝词中“假洋鬼子”蕴含的是非价值与审美内涵,其实隐含着书写者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反思,为寻找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努力找回主体性,具有一定的自我认知功能,体现了民族自觉。所以,竹枝词中“假洋鬼子”的文化隐喻,与作为知识分子自我存在的同一级关系中,与其自身被激发的民族自觉处于对话空间中,促使知识阶层在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审视和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重新认知,书写者的民族自觉体现为“假洋鬼子”的文学塑形,是中国知识分子极力找回主体性和话语权的真实显现。

依此而论,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样式,共同建构了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社会总体想象物,更是承载着知识阶层

在寻求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精神痛苦和文化选择,也让我们反思如何理性地看待民族自觉。若对自我文化的认知存在着定位不清的情况,或没有科学客观地分析“假洋鬼子”的审美价值,会导致不知从何处寻求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困惑不应停留在对西洋文化的殖民主义作浅层理解,更深层的是国人文化信仰危机的问题。西学东渐确实在中国现代进程中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同时也摧毁了国人的文化信仰。在国人无所适从之际,“假洋鬼子”这面现实之镜真实地照射了中国形象的他者视域,书写者觉察了中国“他者化”,即“假洋鬼子”透视了中国人亟待解决民族认同的迫切心理,既然存在文化失格、人格错位,那么民族自觉最重要的是如何借由文学书写来“培根铸魂”,如何认清“假洋鬼子”这面主体镜像,以及思考“假洋鬼子”今何在。

五、结 语

对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的审美透视,探究其生成与建构,依此窥探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群体认同心理。“假洋鬼子”既是在涉“外”时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构形,展现了半殖民地特定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同时又是现代性反思视野下“民族自觉与中国塑形”的表征,它折射出书写者在半殖民语境中关注中国“他者化”的复杂心态。竹枝词中“假洋鬼子”形象的书写与建构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民族自觉与主体的现代化思考演变历程,艰难探索向外寻求对话后转向内省求自我转变,是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痛苦的真实写照。它不是中国形象的重塑,客观反映了在“西学东渐”思潮中逐渐显现出知识阶层的“自卑情结”和“内省精神”的交锋。以全知视角从头到尾地对“假洋鬼子”的视觉表述中彰显了书写者的认同心理,是书写者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文学想象,虽颠覆了传统文学想象中的半殖民“中国形象”,却丰富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形象的内涵和对“西化”的科学认知。因此,笔者认为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价值在于,它反映了知识阶层“自我怜悯情结”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集体想象为“不土不洋”的病态人格时,真实地映照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某

一阶段举步维艰、无所适从的时代困境,同时启示我们对涉“外”形象和文化资源的理性思考。只有从“假洋鬼子”这面真实存在着的“西洋镜”,来透视中国知识分子民族存亡精神情结与敏感的文化自信,以及底层在文化危机与文化选择中的民族自觉,才能深度挖掘出为何“假洋鬼子”是“民族自觉”异化镜像的审美内涵。如果仅只是将“假洋鬼子”作为文化对抗的“替罪羊”,而忽略了其生成的社会根源及书写者审美意识的嬗变,显然忽视了知识阶层民族自觉生成的内在机理和主体性。或许关注带给我们的当代启示和反思方能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独立思考如何参与去殖民化讨论。

[参考文献]

- [1] 方维规. “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论19世纪汉语涉外词汇和概念的演变[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13(4): 57-70.
- [2] 李永东. 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3): 137-160; 207.
- [3] 丘良任. 中华竹枝词全编: 北京卷[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 [4] 雷梦水. 中华竹枝词[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7.
- [5] 丘良任. 中华竹枝词全编: 上海卷[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 [6] 俞祖华.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世代与类型[J]. 东岳论丛, 2012(3): 32-41.
- [7] 阿英. 晚清文艺报刊述略[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 [8] 保尔·利科. 从文本到行动[M]. 夏小燕,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9]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第2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 [10] 费雷德里克·巴斯. 族群与边界[M]. 李丽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1] 王汎森.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12] 阿布拉姆斯. 社会认同过程[M]. 高明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13] 丘良任. 中华竹枝词全编: 广州卷[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 [14] 拉康. 拉康选集[M]. 褚孝泉,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1.

Literary Shaping and Alienated Image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Fake Foreign Devils” in Zhuzhi Ci

LUO Jie^{1,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00,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ima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mage of “fake foreign devils” appeared in Zhuzhi C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the product of the heterogeneous cultur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It reflects the 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groups in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The “fake foreign devils” in Zhuzhi Ci mainly include four types: “Yeyou disciples”, “overseas students”, “foreign slaves” and “Xizai”. They constructed alienated Chinese images in literary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ti’s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personal identity and aesthetic identity. They provided paths for the psychological demand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uch as cultural crisi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option. The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of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reveals the subtle change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i, and it is also a cultural metaphor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which has special literary aesthetic value.

Key words: “fake foreign devils”; cultural memory;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lienated imag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 陈蒙腰)